



作者在图书馆阅览室

序

京杭运河是人类史上的奇迹，它始凿于公元前5世纪，是历史最悠久的人工运河。它全长1200公里，穿越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天津、北京六省市，沟通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它流经的是东亚大陆最富庶、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

京杭运河不仅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交通命脉，还哺育了一大批运河城市，聊城就是随漕运兴起而繁荣起来的文化名城，后来也是因为漕运废弃而有半个世纪默默无闻。

历史告诉我们：交通兴则百业兴，交通衰则百业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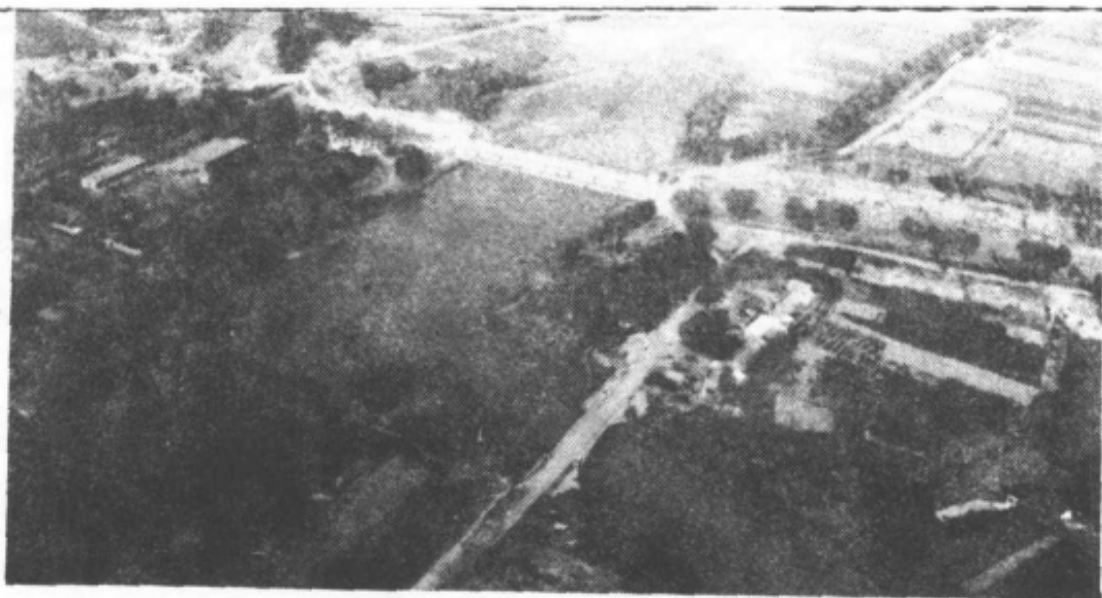
如今，历史重新选择聊城，京九、济邯两大铁路在聊城交汇，从此以后“天下不敢小聊城”，但聊城何以对天下？察古思今，聊城人怎能不奋发图强，满怀信心，展望未来，努力建设21世纪的新聊城！

本书作者魏聊同志现任聊城市文物管理所所长，副研究员，今年35岁，比较年青，但也是有15年文物工作经历的“老文物”了，所以他对于聊城地方史资料是熟稔的，对于给聊城的历史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京杭运河以及运河文化是有研究的。此文成书时间极短，但却凝结了他多年来的知识

积累和思想成果。虽然书中有些文段缺乏锤炼，某些论点有待商榷，笔墨恣肆，但也不乏真知独见和精彩片断，对运河的兴衰和聊城的历史勾画出了一幅具有蒙太奇意味的画面，并站在文化的高度，展望了 21 世纪的聊城。此外，魏聊同志还自称是“半个摄影家”，书中图片也包含了他对哺育他多年的历史名城的理解和爱。此本小书，值得一看。

慧明于幽州书院

1997 · 4



第一部 人类的奇迹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
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绵绵不绝。

万里长城，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造工程；
京杭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流。

长城，是祖国西北大地上阳刚的一撇；
运河，是祖国东南大地上阴柔的一捺。

长城、运河在东方大地上写成了一个大大的“人”字，
这，就是中国！

要了解中国历史，就要了解大运河。

时间追溯到公元前 770 年——前 221 年的春秋战国时

期，这是中国历史上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大转变时期，当时作为宗主国的东周日趋衰微，王室分封的一百多个诸侯国，展开了一场长期而频繁的兼并战争。在思想领域，各国争相变革，百家诸子纷纷著书立说，出现了自由争鸣、共同发展的繁荣局面。

这一伟大的时期也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一个黎明期，在世界各地同时产生了一大批卓越的思想家，形成了人类精神发展的一个中心时代。

在古代印度，释迦牟尼创建了佛学并使之成为后来的世界三大宗教的佛教。

在古代希腊，民主自由的社会产生了民主自由的哲学家苏格拉底。

在地中海东海岸，出现了给予犹太人的基督教以重大影响的以赛亚弟，在其之后的耶稣创立了统治西方精神世界千余年的基督教。

中国的道家始祖——老子完成了他亘古传世的《道德经》，并成为道教的经典之作。

当时的孔子五十余岁开始周游列国，宣传他的儒教学说，晚年则教授弟子三千名，并著书立说，至汉代始，儒家思想在中国取得正统地位。

也正是在同一时期，人类史上两项伟大的工程：长城和运河开始建设。

时间延续到 20 世纪，人类仍在接受着那个时期的恩惠，仍在享用着那个时代所遗留给我们的巨大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东方城市的出现侧重于城，军事性质较明显；而西方城市的出现侧重于市，商业性质明显。同样，东方大地上的长城和运河都是出于军事需要而建设，所不同的是，长城是燕、赵、秦为防御而修建，而运河则是为了战略进攻而始凿。

地处太湖流域的吴国，其国君阖闾为了向西扩展势力范围，于公元前 506 年，命伍子胥主持开凿了从太湖向西直达长江的胥溪运河。后来，阖闾带领军队从胥溪进攻楚国，取得很大的胜利。这条长 100 多公里的胥溪，是中国最早的运河。

阖闾之子夫差在战胜越国之后，一心要北进争霸。公元前 486 年，他下令于长江北岸的蜀冈上筑邗城，作为讨伐齐国的据点。同时，在邗城向北开凿一条运河，引长江水北流入淮水，全长 185 公里。因这条河从邗城城下流过，故称“邗沟”。公元前 486 年，吴将徐永率领水师经邗沟转淮水，出海北上攻打齐国。第二年，在艾陵打败了春秋时期第一个建立霸业的齐国。

这条邗沟，就是后来隋炀帝疏通扩大的山阳渚。这就是京杭运河最早的一段。

而大运河的全面开凿始于隋炀帝杨广。他开凿大运河的根本目的，完全是出于封建帝国统治的政治和经济需要。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东晋以来 270 年的南北长期分裂局面，但新政权很不稳固。特别是在东南地区，反隋活动此起彼伏，隋王朝乃调集大军前往镇压，大规模的军事活动需要先进交通条件的支持。再有，隋炀帝好大喜功，准备发动对高丽的战争，需要在涿郡建立据点，这就是他开凿运河的政

治和军事目的。

开凿大运河的经济目的也十分明显，那就是隋朝在长安和洛阳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需要充足的粮食和其它物质的供应。当时，统治中心——关中地区，已远远不能满足其需求。而江南地区十分富庶，转移江南的财富也急需开凿运河。

于是，在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即隋炀帝即位的第二年，就下令开凿大运河。随即，征发360万民工，在北方修通济渠，从洛阳西苑通到淮河边的山阳（今江苏淮安），使洛水、黄河、泗水、汴水与淮河相通。

同年又征发10万劳动力，疏通扩大山阳渎（即邗沟），南起江都，北至山阳，又使淮河与长江连接在一起。这样就可以从隋朝东都洛阳直达扬州了。

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征调民工100万，开永济渠，南接黄河，北通涿州（今北京东南）。

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开江南河，北至京口（今江苏镇江），南至余杭（今浙江杭州）。

前后共用了六年的时间，大运河全线工程告成。这条长达2700公里的大运河，第一次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水上交通网。

正如秦始皇筑长城一样，大运河的建设史也是劳动人民的血泪史。仅开凿通济渠，就征用了360万民工，工程不到三分之一，就“尸毙满野”，减少了150多万。

封建社会的伟大的工程往往以巨大的牺牲作代价，此时，不禁使我们对“伟大”二字的使用颇为踌躇。

隋炀帝从东都洛阳下江南，到扬州南巡观花，他和他的后妃、王公贵族、文武大臣坐的船只有好几千艘，首尾相连，长达200余华里，纤夫就有八、九万，还有20多万骑兵沿河护行。隋炀帝乘坐的龙舟，上下四重。沿途每到一地，500里以内的老百姓都要进献羊羔美酒、山珍海味，客人吃不了，就统统倒掉。

隋炀帝在他下令开凿的大运河上风光无限，这位劳民伤财的暴君也为此葬送了自己的帝国，包括自己的生命。在他第三次下江南时，在扬州被手下大将所杀。

运河——2700公里的人工河流，2400年的历史，从长度到时间都远远超过著名的国际运河——173公里的苏伊士运河，不过，从使用价值，经济效益和真正的生命力来比较，不能不引起我们全民族的深思。

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我们中国人的社会决策方式优劣何在？

公元618年，统治仅38年的隋王朝灭亡以后，又经历了唐、五代十国、宋辽金等朝代更替。到了13世纪，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了中国，定都大都（今北京）。中国的政治、军事中心由中原地区移到北方，而经济财富中心仍在江浙一带，原来以洛阳为中心的运河系统已不能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于是，元王朝继隋之后又一次大规模地开凿运河。从公元1283到1292年，先后开凿了三段河道，把横向的绕道中原的大运河，改造成以北京为中心，南下直达杭州的纵向大运河。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地图上所看到的京杭运河的基本路线，它比隋朝大运河缩短航程近一千公里。

聊城在这一时期，加入到了运河城市的行列。据史籍记

载：

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3年），因江淮水运不通，曾开凿自济宁、兖州经东阿至利津入海的运河，后因海口阻塞，又从东阿舍舟登陆运200余里到临清入卫水，又北合漳水以输京师。道经茌平，地势低下，夏秋霖潦，艰阻难行。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寿张县令韩仲辉和太史令边源提出建议，从安山（今山东省梁山县安山西南）至临清开挖运河，以利漕运，并减轻民众的负担和运输之苦。根据这一建议，凿成了一条长达250公里的漕河。从安山起，经阳谷、聊城至临清，引汶入济，入于卫漳。建闸31座，以节水势。河成，命名会通。从此，南来河段无需陆运，可由水路直达京师。



有句话说：时势造英雄，还可以说成：时势造城市。而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交通兴则百业兴。

聊城早在春秋之时称聊摄，是齐西之弱小方国；秦置聊城县；北魏称王城；隋唐五代，聊城为博州治所；后晋开运二年（945年），黄河决口，王城淹没，州县治南迁巢陵城，其城址在今城东8公里处。宋淳化三年（992年），黄河再度决口，巢陵城毁，州县治迁至今所，宋熙宁三年（1070年），筑土为城；金代，聊城仍为博州治所。

元至元十三年（1276）五月，元世祖忽必烈改革全国行政设置，易博州为东昌路。

但元代苦短，聊城并未因漕运之便真正发展起来。

与此相反，元末明初的战乱给东昌府带来极大的灾难。据史籍记载：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明大将常遇春率军北伐，在东昌与元军激战，最后攻入城内，见各家门悬一木牌，上写“欢迎明军”，背面是“欢迎元军”。常遇春下令屠城，使城郭内和附近村庄断绝人烟。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东昌府属18个州县只有22680户，241340口，平均每个州县只有126户，1340人，荒无人烟的情况可想而知，哪里还有什么繁荣可言。

所以东昌一带有句俗话流传极广，“若问俺从哪里来，洪桐县城老鸱窝”。从地方出土的墓志碑文记载来看，族谱追述到明洪武以前的绝无仅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是明洪武以后从山西和胶东迁至东昌的。但是到了清雍正九年，《聊城修护城堤碑记》载：“……夫郡邑城中仓库册籍，上关国计，廛市烟火相望，不下十万户……”，可见明中后期至清前中期，聊城的人口增长极快，这与会通河的疏浚和极度发展的关系极为密切。

而在元末明初，由于战事频繁，会通河主要表现了它的军事战略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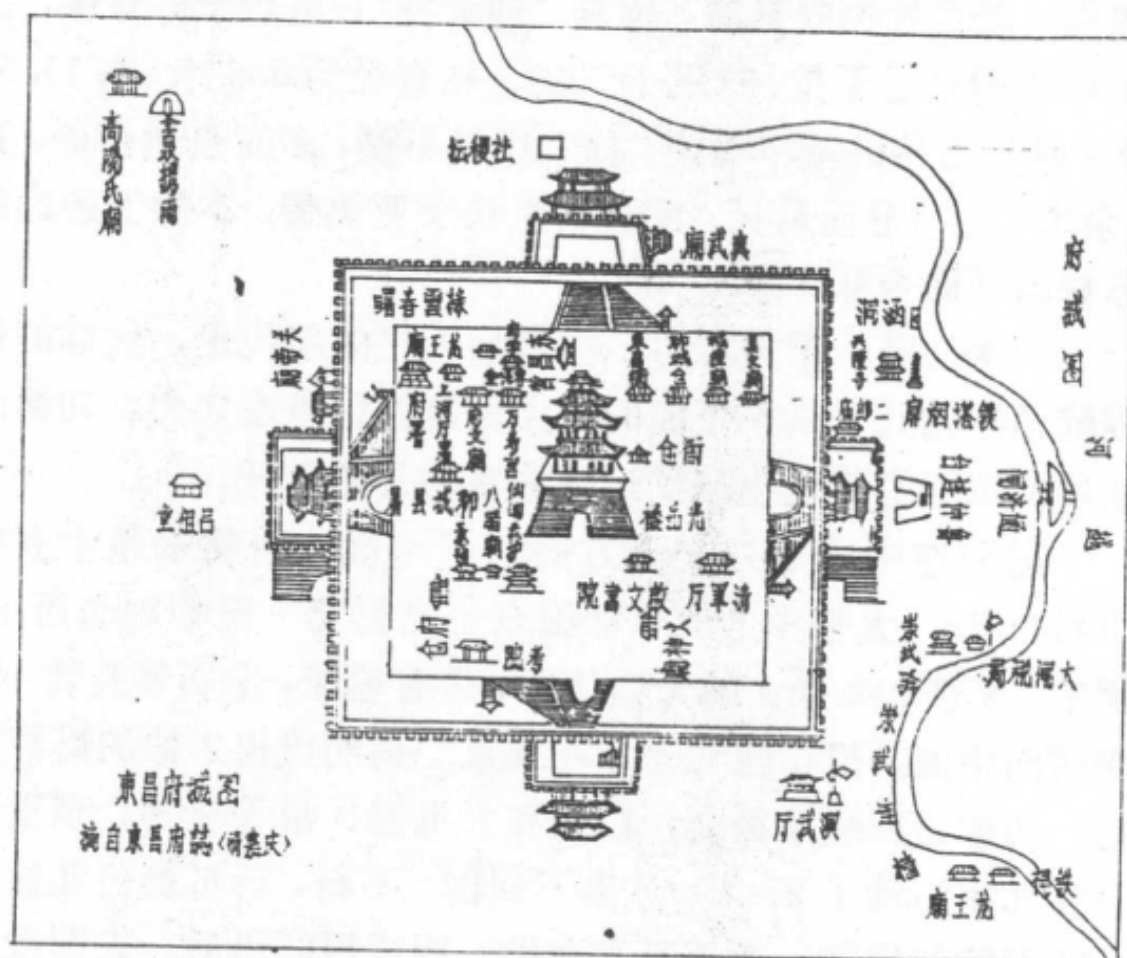
元朝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都于大都。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山东成为大都的南部屏蔽，特别是东昌一带，是联络河北与江南的纽带。元朝末年，田丰、毛贵率起义军扫荡山东，元政权南北的联系被切断，南方已无法控制，朱元璋的势力从而得到发展。其后，朱元璋命将北伐，亦先下山东，会师东昌，然后进逼大都。

明洪武初年，东昌路改为府，隶山东布政司。明朝虽然定都南京，但是由于北平曾有辽、金、元朝继作陪都或首都，长达 400 余年，已经成为北方政治军事重镇。它对控制蒙古和掌握北方局面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性，而东昌府作为联系南京与北京的纽带，其战略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当时，东昌府百姓人口虽少，但驻兵数量十分惊人。据史料记载，明初东昌一地就驻有东昌、平山二卫，每卫五千六百人，兵额共一万一千二百人，于要害地区设置。当时数府才划一个防区设卫，而东昌一地就有二卫共存，可见当时东昌战略地位的重要。

这一时期的运河与东昌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战争。

明洪武二年（1369 年）到明洪武五年（1372 年），刚刚上任的东昌卫守御指挥佥事陈镛，就急忙将宋熙宁三年（1070 年）所筑土城改建为砖城。明正德十六年李延相在《重修东昌城记略》中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补记：城周七里有奇，高三

丈五尺，厚三丈，池阔三丈、深二丈。四门，东曰春熙，西曰清远，南曰正德，北曰宣威。设城楼二十七座，其中以西北角之绿云楼、东北角之望岳楼最为壮观。附城为廓，廓外各设水门、吊桥，环以护城堤，延亘二十里，以御水涨，全城绮之，而且全部甃以砖石。



东昌古城出于军事需要而建，城高，池深，外形上有瓮城、扭头门、马面之类建筑，极其坚固，所以历来有“能陷不失的凤凰城”之说。

明朝的东昌卫守御指挥佥事陈镛用了短短七年的时间，就修建了一座坚固而雄伟的城池，而这座城池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运河运来的。

洪武七年(1374)，陈镛又为了“严更漏而窥敌望远”，报时报警，利用修筑城楼之余木，在古城中央建造了一座高达百尺的更鼓楼，初名“余木楼”。这座楼就是后来被公认的东昌府的象征性建筑——“光岳楼”。

登过光岳楼的人，无不为楼基上矗立的三十二根金柱所吸引，老百姓惊叹其高，称其“通天柱”，虽然十分夸张，但足以表明柱之罕见。这三十二根金柱直径为0.6米，高11.58米，是光岳楼的基本骨架。柱之用料不整，多有自然弯曲，其“余木”性质显而易见。此柱料生长于亚热带，本源于遥远的苏禄国（即今菲律宾）。

一木初卧，千夫难移。在肩抬人扛的年代里，这样的长程陆地运输几乎是不可能的，无疑是假借舟水之力。初凿的会通河责无旁贷地担当了运输战略物资的重任。

运河在中国对外交流方面功不可没。明朝永乐十五年(1417年)，太平洋上的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巴哈刺与西王、峒王，率领340余人的大型使团，带着珍味，宝石等礼物，渡海访问中国，沿运河北上，在北京受到明成祖朱棣的盛情款待。明成祖回赠了黄金，白银和大批锦、帛等礼物。东王一行在北京活动了27天，才南下回国。不料，行抵德州北边一个叫安陵的地方，东王不幸逝世。明成祖闻讯后，立即派遣礼悦官员前去赐祭，举行隆重的葬礼，将东王安葬德州城北。

由此可见，中苏交流比较密切，元末明初两国的物质贸易则不足为奇。

如果说光岳楼上的修城余木是大运河运来的，那么说修城之大部分木料也是运河运来的，不会有什么谬误吧？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9年),明太祖朱元璋崩,惯于征战的燕王朱棣拥兵北平,威胁着帝位。朱棣以“清君侧”为名,组织起“靖难军”向明惠帝朱允炆发起进攻。明惠帝建文二年(1400年),朱棣率军进攻东昌,守军盛庸迎击,战败燕王的“靖难军”,并斩其将张玉。朱棣败阵后,被追杀到聊城东关隆兴寺(即铁塔寺)南的白玉桥边,藏到了桥下,方免于难。

但,到了建文四年(1402年),燕师越过东昌而驱师徐州。至此,虽有长江天险也无济于事了。

永乐,朱棣迁都北京后,政治地理形式再次发生变化,东昌府重新处于北方政治中心与江南财富之地相联络的纽带地位。

明洪武二十四年,会通河因黄河决口而淤塞。

永乐初,载重300石以上的粮船经淮河、海河抵陈州颍歧口入黄河,运至阳武、转陆运,至卫辉再入卫河,再用可载重200石以上的浅船运输北上。劳费甚巨。

明永乐九年,成祖采纳济宁同知潘敦正建议,以会通河作为整浚运河的主要河段,任用工部尚书宋礼总管,征调十六万民夫修治一百九十公里的河道。宋礼采纳汶上老人白瑛建议,取汶水独流,堵汶水入海通道,令其全部注入运河,在南山漕道脊背处的南旺口(今济宁北),分流入南、北水道,又以“相地置闸,以时蓄池”(《明史·宋礼传》)的方法在南旺至徐州(落差一百一十六尺)之间置闸二十座,在南旺至临清(落差九十尺)之间置闸十七座,使南来北往船只顺

利通过南旺这个运河的脊背高地，于是，大运河才开始全部发挥它的能量，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

永乐十年（1421），岁以河运百万石，海运三岁两运，至永乐十三年，竟罢海运。

明代大学士丘浚说：“会通一河，譬则人之咽喉也，一日不下咽而立有死亡之祸”，漕运粮道成为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

据《明史》记载，宋礼建议造浅船 2000 余艘，以供漕运。开始岁运 200 余万石，后来逐渐增加到 500 万石。到成化年间，岁运漕粮稳定在 400 万石。除正粮之外，还有商粮及其它。按大学士丘浚提供的数据“今日十八人架一船，一船载米三万石”来计算，每年经过运河的船只仅漕船一项就达 10,000 只到 16,000 只，运军达十几万人，每年有如此众多的船只、人口通过运河，不能不造成运河沿岸城市的迅速繁盛。

至此，聊城的经济、文化才得利于运河，而走向极度发展之路。

首先，官府允许漕运军人船只附载自己的货物。洪熙元年（1425 年）的一道敕谕说：“官军运粮，道远辛劳，寒暑暴露，昼夜不息，既有盘浅之费，粮耗米折之司，又责其赔补，朕甚悯之。今年除运正粮外，附载自己的什物，官司毋得阻挡。”正统三年（1438 年）又重申：“顺带土货以为货，不准沿河巡司官人等生事阻挡。”对于漕船所带之货，各钞关免征税钞。弘治时，每船带物限 10 石，到万历时则至 60 石之多。实际的数字肯定要多于上述估计，因为免税带货是有利可图

的。

其次，大批的商船来往于漕河之上，将南方出产的丝绸、茶叶、糖、竹、木、漆、陶瓷器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北方的松木、皮货、煤炭、杂品又经运河南下。

商业的兴旺又大量增加了官府税收。洪武时规定，商税三十取一，违者以违令论。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山东巡府陈济言：“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商贩所聚，今都北平，百货信往时。其商税宜遣人监榷一年，以为定额”，朱棣批准了这一建议。税有定额，虽便监督，但定额长期不变，往往脱离实际。宣德四年（1429年），各钞关差御史及户部官照钞法例监收船料钞。所谓船料，是船只大小的一种计量单位。其后税收之法不断更改。

由此可见，运河交通的兴旺，首先带动了商贸业的发展，进而国家税收也大量增加，而沿河城市的发展更是显而易见的。

由运河所产生的仓站、闸站和漕粮支运、兑运和交接处，无疑是人口集中之地；江河交叉口，州县水陆相会之所，当有车马人口日常之需要，于是，酒楼饭馆、店客栈、商铺货店、码头驿站、配套的经济行业也随之而兴。于是，过去的荒丘野地，此时成了繁荣小镇；过去小村僻庄，此时成为重要都会。东昌府不再是人口稀少，仅仅作为屯兵之处的城市了。



第二部 运河与聊城

京杭运河的开通航运，促进了我国古代经济、文化的发展。穿城而过的运河也给鲁西重镇东昌府带来了长达 400 余年的繁荣昌盛。

穿越东昌府城的一段运河，南起龙湾，北迄北坝，全长 5 公里。在府城东一公里处，东关大街的东首设有一闸，称“通济闸”，本地人称之为“闸口”，是运河之水流经东昌的咽喉要地。河中桅樯如林，商贾云集，岸上百货灿陈，古迹耸立，精英荟萃。东昌府被誉为“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江北一都会”。

通济闸以南不到一公里的范围内就有大、小两个码头，河中停泊船只接连数里；运河上一年四季船只来往穿梭，以致常常造成过闸拥挤、停船待闸的现象。由于此段穿越东昌府城的河段过于拥挤，东昌府又不得不在此段东部，城市的边缘地带另外开凿一段河道，使不需在东昌停泊的船只顺利通

过。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水道“外环路”吧，当时称其为“越河”，其意也是越过东昌府城之河的意思。在这条小河两旁，很快形成了新的闹市区。为了便于两岸来往，又在越河上先后架起了12座形状各异的小桥，人们称之为“十二连桥”。在运河与“越河”之间称为越河圈，这一带船如梭，人如潮，店铺鳞次栉比，作坊星罗棋布，一派繁荣昌盛景象。

聊城还是沿河周邻地区农副产品输出的集散码头。当时，南北各地的货物由船运来，卸于码头两岸，或在本地出售，或由行商转运周邻各地。在东关菜市设置总栈，收买当地和在平、博平等县的乌枣及东平等地的烟叶，然后装船运往天津、镇江等地。仅枣一项，“出入有数百万之多。”此外，“它若瓜子、槐花、槐豆、杏仁、炭灰、萝卜干、菟丝子，亦各装大包，一同南返。”同时，聊城所需之煤油、火柴、红白糖、糯米、纸张等洋广杂货亦自天津、上海源源转输而至（1901年《聊城县志》、1908年《聊城乡土志》）

由于交通、货易发展，也大大刺激了农副产品及棉花的种植及其商业化。在当时，山东六府皆植棉，然以“东昌尤多”、“种者多获其利”，“居人以此致富。”由此可见，聊城地区的农民植棉发家是有历史渊源的。

《东昌府志》又载，当地市场上除“江淮贾客”、“辽左布商”“青州布客”外，尚有本地“富者积花时余巢”“以余入巢出为利”，当地的商人阶层也大有发展。

除棉花外，东昌府还出现了“千亩之家，千树枣梨”的经营者。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农村的经济作物大量增加，粮食种植面积大量减少，以致于粮食的供给要依靠外地输入。

清朝前期，由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振兴经济的措施，东

昌府的商业发展达到鼎盛时期。“通济闸”一带极度繁荣，竟大大超过了东昌府城区。据同治十三年所立《旧米市街太汾



公所碑记》记载：“聊摄为漕运通道，往来船舶，络绎不绝，以故吾乡之商贩者云集焉，而太汾公所者尤多。自国初至康熙间，来者踵相接，贾寓旅舍几不能容。”各地商客相继在聊兴建了太汾公所、山陕会馆、江西会馆、苏州会馆、武林会馆、赣江会馆等。其中，兴建山陕会馆即耗银 5 万余两，仅第四次重修即用银 49643 两，为专刻一对石狮就用银 592 两。由此足以见聊城商贾富庶豪华、地方经济繁荣发达之一斑。据《聊城地区商业志》记载，乾隆、嘉庆年间，仅山陕商人在聊创办的大型商号就有五、六十家，中小型者不计其数；开设的大小旅店有二、三十处；经营的金店、银号、药铺等业作坊鳞次栉比，染坊、茶庄、书店、笔庄等铺店星罗棋布。至道光年间，秦晋商人在聊开设的大型百货店铺 30 多家；前店后厂的铁店 14 家；印刷纸店 23 家；大小毛笔作坊 30 多家，年产 300 万支，畅销大江南北。至光绪年间，商业铺、店、摊、贩遍及城镇乡村，大小商号数百家，百货业、五金业、书店

业、印刷业、饮食业、副食业、杂货业等几十种行业，业业俱兴，其中饮食服务的店铺达 50 多家，烟、酒、茶、糕点摊点 300 余家，纵横交错的街巷中，各式各样的店铺比比皆是，形形色色的产品琳琅满目，最为世人称羨的是“金太平，银双街，铁打的小东关”三条街市。

如今运河岸边的大码头已非原貌，小码头旧迹犹存。而这一带的街巷多布列在运河西岸，随坡就势，依河而建，大小街衢皆与运河相通，形成放射性骨架。运河区的街巷之名与运河与商业紧密相连，象南顺街、北顺街、馆驿街、米市街、越河街等。而运河两岸的建筑也多为砖房小舍，呈现前店后堂的商埠风貌。

今天，当我们伫立于通济闸旁，望着闸口桥上的人流与车流，再看一看桥下倍受冷落的运河道，遥想此处往昔的繁盛，怎能不心生感慨！人生短暂，流水无情啊！



闸口南不远就是昔日运河岸边的小码头，这是由富商修

建的专供自己使用的码头。小码头全是青石砌成，中间凹槽处有石台级可以上下，左右顶层青石上各有一个圆形穿孔，被船缆绳磨的光光的，其中一个石孔已被磨穿，可见当年系船之多。

小码头南临不远就是大码头了，其面积就亦为青石条垒砌，现已被拆倒，青石被当作了铺路石，已非原貌。但是大码头是当年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多次临幸之地，可以想象龙船一到，地方官吏群迎向前，锦衣侍卫鸣锣开道，皇帝在众人促拥之中走下龙船，是何等的气派场面。



大码头虽早以不复存在，但当地却久久留传着“今日无税”的故事，传说有一次康熙皇帝来到东昌，有一个百姓求见，侍从不耐烦地挡驾曰：“皇上有旨，今日午睡。”这个百姓灵机一动，立刻出去四处喊到：“皇上有旨，今日无税！”众商人感恩浩荡，在大码头上上了“今日无税”碑。皇帝后来方知此事，但事已至此，也只好顺水推舟默认了。此后凡在大

码头进出的货物一律是天天无税，商贸更为繁荣，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

但是，据调查，大码头过去确实有一通御碑，其内容不甚清楚。据史料记载，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清高祖爱新觉罗·玄烨南巡，陆路经恩城、高唐等处，三月回銮，水路经东昌、临清等地。是年旱，免钱粮十分之三，丁赋俱免。看来，东昌府的商贸繁盛还真与康熙皇帝有点关系呢。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有许多看似荒诞无稽的传说，很多是有点影缘的。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皇帝视察河工，第二次顺运河来到东昌，这一次他光临了顺治六年（1649年）进士，刑部左侍郎任克溥家宅——“绮园”，赠“松桂堂”匾，为任克溥题写楹联，“绿水本无忧因风皱面；青山原不老为雪白头”。康熙回銮后，又加封任克溥刑部尚书衔。

康熙皇帝于1709年还来东昌一次。他曾为光岳楼题写了匾额“神光钟暎”，今仍悬于光岳楼二层南檐下，康熙皇帝传世墨迹不多，此匾弥足珍贵。

乾隆皇帝更是极尽风流，多次南巡、东巡。从乾隆十三年（1748年）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期间，九次驻蹕聊城。乾隆皇帝还曾五次登光岳楼，至今聊城还留传着乾隆与莲花井的故事。乾隆皇帝前后在光岳楼上作诗13首，现存碑石二通，载有乾隆御诗七首。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

南邦逢郡邑， 按轡便民瞻。
运路兹经历， 乘舟昔已久。
策蹇惟一例， 便轡更多添。
亲爱不谋合， 熙和著处覩。

平原揽城市， 光岳俯楼檐。

共治二千石， 益思慎选廉。

从诗中可以看出，风流皇帝并非只管风流巡游，观光之际仍念念不忘选拔廉洁的官吏。

乾隆皇帝所带的宫廷画师还把聊城城池，运河风光，名胜古迹绘成大幅写生画，刊入《南巡盛典》一书。

对于当年东昌府所处的重要地位，清代进士牛运震有过这样一段精彩的概述：“太行以东，沧海以西，山之巖高大，兴云雨见怪物者以十数，泰岱最盛。泰岳以西，山势中断，崩崖平衍，跨州连郡，轮蹄四达，殷阎辐辏之区以十数，东郡最盛……夫东之为郡，撼清漕之津，据都邑之会。”

从大码头向南不远就是著名的山陕会馆了，这是聊城八大会馆唯一保存下来的会馆，也是八大会馆中最好的会馆。

山陕会馆位于聊城八景之一“崇武连檣”的中心地带；山陕会馆座西朝东，面河而立；二百多年来，它目睹缓缓北流的运河水，历经世间沧桑，成为明清时代漕运发达，东昌府文化兴盛，经济繁荣的见证。

山陕会馆是山西、陕西商人合建的一处神庙与会馆相结合的建筑群，创建于清乾隆八年（1743年），后历经扩建，方具备现在的规模。其建筑布局，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轴线对称形式，中轴线上的建筑依次为山门、戏楼、献殿、正殿、春秋阁，左右轴线上有钟鼓二楼、南北夹楼、南北看楼、南北碑亭、南北献殿、南北大殿和南北配房，包括亭台楼阁等附属建筑大小一百一十多间。南北宽四十三米，东西深七十七米，总占地面积三千三百一十一平方米。

山陕会馆的山门是一幢三开间的歇山式连体建筑，当心

间开大门，门上有石匾一方，上书“山陕会馆”四个遒劲的大字。



当心间二重檐，下檐短平，纯为装点，上檐宏敞，由六层华丽的十字钻心连接如意拱承托流水檐，琉璃瓦覆顶，上饰以金黄色的龙凤，正脊两端立有金黄色的宝葫芦，整个山门宝顶装饰的雍荣华贵，当心间上檐如鸟之两翅向两旁张开，竟遮住次间的五分之四。次间之檐比当心间下檐还要低，也象鸟翅一样向两旁伸开，整幢山门既对称又富有变化，错落有致，巍峨多姿，集各种艺术于一体，有栩栩如生的额枋木雕，有石匾对联书法，有彩绘的如意斗拱，有石雕狮子柱础，有石版画，有精美的琉璃制品，就连滴水、瓦当也有龙凤图案，完全可以说山门上的任何构件都是单独的艺术品，而整幢山门更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

山陕会馆山门既是多种艺术的组合体，又是多种文化的组合体，自宋代，佛、道、儒就出现了融合，而创建于清乾

隆年间的山陕会馆竟可做为三教合一的典范了。会馆山门的次间门匾分别为“履中”，“蹈和”，意为不偏不倚的中庸至和；左右门壁分别镶有“精忠贯日”，“大义参天”的竖匾，讲的是忠、是义，尽为儒家之格言。而当心间左右立柱对联却是：“本是豪杰作为，只此心无愧圣贤，洵足配东国夫子；何必仙佛功德，惟其气充塞天地，早已成西方至人”，对联均为颂赞关羽之辞，把他喻为儒家的“东国夫子”，佛家的“西方至人”。那么，关羽的本位毫无疑义就是关圣帝君了，标准的道教人物主题。而山门额枋正中雕刻的是一头白象，纯粹的佛教吉祥动物。可见，一幢小小山门尽以容纳了多种文化。

进山门，便是华美的戏楼，迎门一匾，上书“岑楼凝霞”，正是戏楼最好的写照。岑意为小而高的山，说的是戏楼小而高，象灿烂的彩霞凝固在半空中。门左右各有一副线雕石版画，左为松鹤，右为梅鹿。戏楼正面更有一番美不胜收的景象，三间台口的额枋上透雕着一折折古代戏剧，戏中人物神态各异，惟妙惟肖，呼之欲出，道具装饰一应俱全，十分逼真，并饰加油彩。

前台南北壁上各有石刻画一幅，左为“天台胜境”，右为“海市蜃楼”。

聊城过去曾有戏台 10 余处，常年不断演戏，其中建筑最好、形体最大的要数山陕会馆的戏台，因而它的使用率也最高，各种民间的戏曲班社也都以能在这座戏台上演出为荣。从至今仍保留着的各地戏班题写在戏台化装室及后台墙壁上的剧目来看，这里曾上演过多种戏曲，仅题写在墙壁上的剧目就有百种之多。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据说在山陕会馆对面，运河东岸，紧

对着会馆大门，有一座当地群众修建的小关帝庙，它只有一间大门和一间瓦房。这座矮小简陋的小关帝庙和富丽堂皇的山陕会馆这座大关帝庙形成了鲜明对照。小关帝庙的门上有这样一副对联：

河东河西两关爷，一穷一富

沟南沟北双眼井，有苦有甜

这副富有讽刺意味的对联告诉人们，虽然同是一个关帝爷，穷人和富人那里，得到的都是不同的待遇。这副对联不是十分对仗，但寓意深刻而在百姓中广为流传。

戏楼左右各有二层过楼，面阔均为三间，悬山脊，绿琉璃顶。原有过板可通向南边的鼓楼、北侧的钟楼。钟鼓二楼形制一致，均为二层檐歇山十字脊，白葫芦宝顶。

鼓楼二层有阳文横额一方，上书“警聵”，配有对联：

当知听思聪，岂可耳无闻。

钟楼二层有阳文横额一方，上书“振聋”，配有对联：

厥意浑且长，其声大而远。

鼓楼有一幽静的小院，名“望梅”。

钟楼也有一典雅的小天地，名“对岳”。

山陕会馆另一大特色是院落布置设计富有变化，主题醒目，照顾面广，主要建筑与次要建筑的关系处理的恰到好处，堪称是北方园林的不朽之作。

会馆的献殿是最重要的建筑之一，为了重点突出献殿的雄伟，庄严，又为了观戏纳人的需要，会馆最大限度地压缩了第一进院（山门与戏楼之间）和第三进院（献殿与正殿之间）的深度，而为第二进院（戏楼与献殿之间）留出了宽阔明亮的空间。山陕会馆的总深度是七十七米，依次排列着五

幢建筑，将会馆分为四进院，而第二进院的深度竟占了三十余米，占总深度的五分之三，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其大胆的设计，充分显示了古代设计师高超娴熟的设计技巧和深厚的园林美学修养。此院南北各有二层五间看楼，供观戏休息之需要，又有南北碑亭对峙，存有十分高大的碑刻，这些碑刻有的记载了会馆的规模和沿革，有的记载了维修情况或资金来源，均是难得的历史资料。院中全用鹅卵石铺地，青条石铺路。更有两棵粗大的槐树，枝杈盘绕，苍劲古老，使人们感到远古神秘的气息。献殿门前有两尊高达2.8米的石狮，造型雄伟、威武凶猛。会馆的设计者为了照顾观戏者的需要，此院的地面是阶梯形升高的，石狮之上，升三级有二层台，再升四级，可达献殿廊下，步步升高又烘托了献殿的气势。献殿共三幢，每幢三间，共九间，总宽度达三十余米，一字形排开，高度均在十米以上，雄居于进院第三级高台之上。如果说与献殿对峙的戏楼是以小巧精美华丽取胜的话，那么献殿完全是以雄伟气势征服游人，秀气美和阳刚美形成了极好的对比。但就细部而言，献殿也是雕梁画栋，点、滴、角、落均有装饰，中间四柱柱础是石刻麒麟，南北八柱柱础是石雕大象，雕刻技法十分高超，额枋上仍是传神的木雕，内容是著名的“八仙”故事。平板枋是绚丽的苏式彩绘，这在北方庙宇中较为罕见，彩绘内容也极其丰富。殿前正中悬一匾“大义参天”，配对联是：

伟哉壮古今浩气丹心汉代一时真君子
至诚参天地英文雄武晋国千秋大丈夫
另一联是：

非必杀身成仁问我辈谁会忠义

漫道通经致用笑书生空读春秋

南献殿原祀文昌、火神，北献殿原祀财神、大王。

山陕会馆正殿是供奉关圣帝君关羽的地方，关羽本来是三国时期蜀国刘备手下五虎上将，隋朝始被晋王杨广封为护法神伽蓝。而之后的历代皇帝为了统治之需要，都对关羽正式册封。到了顺治时，关羽册封头衔竟达二十六字之多，“忠义神武灵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原有关羽的神像是木雕的，但早年被毁，现在重塑的是泥质神像。神台高一米，做仰莲须弥状，中间端坐持笏关帝，丹凤眼，卧蚕眉，面目慈祥，其左首是纠纠武夫周仓持刀立像，右首是潇洒小生关平手托神印。正殿外观是悬山顶，木构架为抬梁式。

走进第四院就可看到会馆最高的一幢建筑“春秋阁”，春秋阁面阔三间，进深二间，二层檐歇山顶，立于会馆最后端。

山陕会馆虽然是关帝庙，但是在会馆的戏楼上却从未演过关公戏，这其中有一个传说：会馆和神像落成后，馆院主持做了一个梦，梦见关羽嘱曰：“此馆乃商贾集聚之地，不应将俺像塑于此中，既已为之，俺也不再违众望；但有一条须记：关某生前虽有功于世，但也多有过失。因此，凡说书唱戏，不得宣扬于俺；如若违俺所嘱，可不要怨无礼！”主持听了，忙跪地参拜，连声称是，自此后，无人敢违此禁。但有一年，南方来了几个富商，不信此禁，执意要在戏楼演“过五关、斩六将”。主持无耐，只得应允，谁知锣鼓响后，关羽正要挑帘出场，正堂突然“轰”地一声，大火突起，霎时把会馆照的通亮。众人慌忙救火。事情过后，人们却发现堂舍完好无损，唯有那几个富商存有银票的银柜被焚无遗，几

个富商，无不痛悔。自从以后，山陕会馆里再也无人敢演关公戏了。

山陕会馆“梓匠觅之汾阳，梁栋来自终南。”而在建筑形式上集南北于一体，文化内容上合“三教”为一家，1988年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陕会馆是当之无愧的运河明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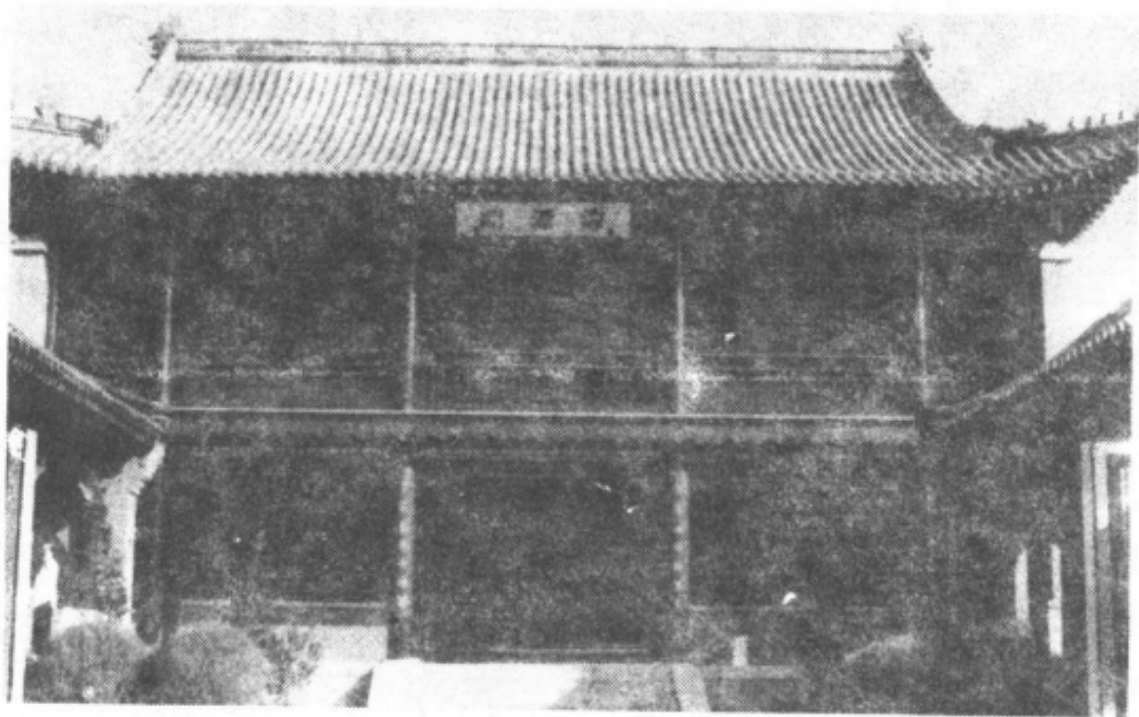
山陕会馆再往南就是龙湾，那是山东巡抚丁宝桢斩杀擅自出京城的大太监安得海的地方。

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文化的昌盛。明清两代，聊城文运大开。据《聊城县志》记载，这期间考中状元2人，进士99人，举人439人。其中既有被明熹宗誉为“讲官第一”的建极殿大学士、吏部尚书朱延禧，清代首科状元、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傅以渐等名宦重臣，又有被清康熙帝赞为“字压天下”的状元邓钟岳等书画大家。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江南河道总督兼漕运总督杨以增建造了清代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海源阁”，为聊城发达的文化又增添了灿烂的一页。

杨以增，字益之，号至堂，一号东樵。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生于聊城。32岁中举人，35岁会进士。后历任贵州荔波、贵筑知县，贵阳知府，广西左江、湖北安襄荆郢道员。51岁为父守丧，家居时建海源阁。服阙，调任河南开归陈许道员，后升任甘肃按察使，58岁任陕西布政使，59岁升任陕西巡抚并权陕甘总督，60岁任江南河道总督。咸丰六年（1856年）卒于江苏清江浦任所，谥“端勤”。杨以增一生嗜好藏书，任湖北襄郢道员时正式开始收购书籍，任陕甘总督时以购精刻本、善本为主，兼收并蓄，此时所购书籍甚多；任河道总督时，得苏州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颇多，此时购入

珍本、善本最多。

因此说，杨以增“实际上搜括了南方藏书家之精英”，并借主管河道之便，用粮船运鲁，庋藏于海源阁，从而一举改变了我国藏书以江南为中心的局面，成为中国藏书史上与江南对峙的“北杨”。在社会动荡之际，将流散于社会的秘籍珍本聚而藏之，这在客观上无疑起到了保护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作用。



海源阁藏书楼位于光岳楼南万寿观街路北杨氏宅院内。

海源阁为单檐硬山脊南向楼房，座落于杨宅三进院北上房东侧跨院内，面阔三间，上下两层。下为杨氏家祠，供杨氏先人牌位；上为宋元珍本及手抄本等秘籍收藏处。藏书楼上层中间门额上悬挂“海源阁”阳文匾额一方，白地蓝字，长112厘米，宽45厘米，字径25厘米，跋文字径4厘米。匾额为杨以增亲书，额后有杨以增自题跋语，曰：

先大夫议立家庙未果，今于寝东先建此阁，以承祀

事，并藉藏书。取《学记》“先河后海”语，颜曰“海源”，盖寓追远之思。亦仿郑范氏之以“天一”名“阁”云。时道光二十年岁次庚子亥月中浣，以增敬书并识。

跋文下钤有“杨以增”和“至堂”阳文篆体印章两方。藏书楼檐廊门前立柱上，有木刻楹联一副：

食荐四时新俎豆

书藏万卷小蓬莱

海源阁二层楼上面积不大，除楼梯外，仅两间藏书，东南两壁放置书架三个，北壁放置书橱一个，书架二个，楼梯右侧放置书架二个。藏书楼前有一长条状小院，东侧有两座长廊式高台读书书亭。楼下东首为通往后院的甬道。杨宅第四进院内有北瓦房五间，东西瓦房各三间，为海源阁明清版本藏书处。

同治十年（1871年），杨以增之子杨绍和曾编著并刊行《楹书隅录》10卷，内载海源阁所藏珍本268种。后来，杨以增之孙杨保彝还编有《海源阁书目》六卷，分经、史、子、集四部，载书3236种，计208300卷有奇。另有不载于书目者尚多。

海源阁藏书之多之精，当时已名闻全国。它与江苏常熟瞿绍基的“铁琴铜剑楼”，浙江杭州丁申、丁丙的“八千卷楼”，浙江吴兴陆心源的“皕宋楼”，合称中国清代四大私人藏书楼。其中又以瞿杨两家所藏宋元刻本及名人手抄本最多，故又有“南瞿北杨”之称。

本世纪初，海源阁藏书全部外流或毁于战乱。

海源阁在我国藏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多方搜集，海源阁历年失散的书籍，大多归入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把海源阁藏书和《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珍贵书籍存于“善本书库”。山东省图书馆则把海源阁藏书集中起来，开辟了“海源阁专室”。

1959年，新建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在中国通史陈列“高度发展的明清文化”一纲中的“官私藏书”条目里，重点介绍了四个全国著名的官私藏书处，聊城海源阁列于其中。它和北京的皇家图书馆“文渊阁”，皇家档案馆“皇史宬”，宁波的“天一阁”并列为中国历史上官私藏书的典范。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聊城不光是藏书有名，刻书制笔业也十分发达，是全国刻书制笔的一大中心。

这一时期，东昌府的文化艺术事业也得到了极快的发展，高跷、旱船、评词、鼓书等传统文艺经久不衰，泥塑、剪纸、木版年画等民间艺术异彩纷呈。在此，不能不特别地提一提东昌的特色曲艺“八角鼓”，因为她也是大运河运来的。

八角鼓原盛传于京都，是满族人游牧时的娱乐歌曲，清乾隆年间发展为坐唱艺术形式，清中叶沿运河南下，传入东昌，与当地语言交相融汇，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说唱艺术。主要伴奏乐器为八角小鼓，及三弦、截板、小钹。演唱形式灵活，可有专门乐队，也可演员自兼；可一人一角，也可多角；可演全套戏，也可演折子戏。演奏时手指弹击鼓而发出鼓声，同时摇震鼓身或指搓鼓而发出钹声。演唱委婉动听，引人入胜。

但是运河绝非只给社会带来积极因素。正如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学习、借鉴、引进了外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

方式一样，资产阶级的腐朽的生活方式和自由化思潮也随之涌入中国。

运河的开通也使的曾经闭塞的东昌民众受到商业利润、金钱物欲的重重撞击；在这块小农自然经济的土地上也出现了弃道德求利欲，轻来世重现世的暗流民风。据山东博平县志所载：

……至正德嘉靖年间而古风渐渺，而犹存什一于千百焉。……（过去）乡社村保中无酒肆，亦无游民，……畏刑罚，怯官府，窃铁攘鸡之讼，不见于公庭。……由嘉靖中叶以抵于今，流风愈趋愈下，惯习骄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珠艳色为盛礼。其流至于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纓帽细鞋，纱裙细袴，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然勿振，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逐末游食，相率成风。

在这里，传统的“安贫乐道”不见了，有的只是追富而忘乎所以；正统的忧国忧民也不见了，有的只是为自己而求享乐。山东原是风淳俗厚的齐鲁之地，尚且如此，那么，到江南运河区去看看，“其中士风之变，吴中尤甚”，“一呼则数十成群，强府县以理外法外所不可从之事，稍佛其意，则攘臂奋袂，哄然而起。提调官莫可谁何，于是兰袍大王之号兴，愈变而愈不古”，这已是到了目无“王法”的程度。

封建社会在中国延续二千多年，此时也已走到了尽头。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闭关自守的清朝中国，“烟花三月下扬州”，“隔江犹唱后庭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政治上日益腐败，漕运水利连年失修。

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夏二月，黄河决口于河南铜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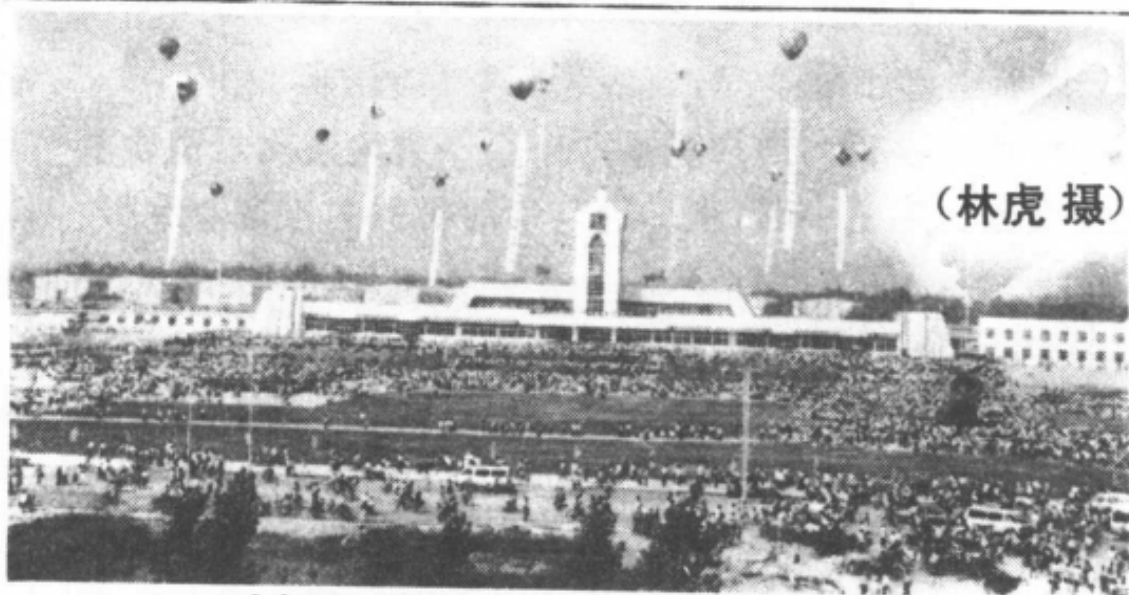
厢，由东明直注荷泽，分流经张秋穿运河，归大清河入海。此次决口造成京杭大运河淤塞，中断了漕粮运输，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也随之中断，东昌府与运河有关的工商业一蹶不振。城市的衰败不可避免地来临，津浦铁路开通后，名声显赫的东昌府更象一个时代的弃儿，告别了她的辉煌时代。

东昌府随运河兴而兴，伴运河衰而衰，此处现象显而易见。但是，难道东昌只能借外部交通条件的兴衰而变化吗？自身真的没有内在的生命活力保持自身的繁荣吗？

今日聊城正处于借大京九重新振兴的机遇关头，目前已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如何才能保持持续、长久的高速度发展，这是事关聊城未来的一个大问题。

运河的历史是一位老师，我们需要从中借鉴的究竟是什么？





第三部 展望二十一世纪

公元197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位缔造者相继离世，巨星殒落，大地颤动。历史的巨浪淘尽了沙砾，中国走进了一个新的时代。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把中国引向了繁荣富强之路。

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古老的中国焕发了无限的活力。要想富、先修路，经济的发展先解决路的问题。这个时候、京九铁路应运而生。

京九铁路北起首都北京，南下直达香港九龙，全长2400公里，跨越北京、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西、湖北、广东、香港九省地。

京九铁路于92年10月动工，以现代化的设计，现代化的施工，现代化的速度提前完成了全部工程，一九九六年九月一日全线贯通。建成后的京九铁路是介于京广、京沪铁路之间的、现代化程度最高、功能设施配套最齐全的交通大动

脉。

京九铁路是祖国大地上的一条血脉，北起首都是中国人的心，南连香港是祖国母亲的手，母亲终于拉住了香港，拉住了这个失散了九十九年的儿子。香港百年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史，也是运河文化衰败史，为了我的一九九七，香港回归的日子，多少人在失声痛哭，多少人在高兴落泪。

京九铁路还象一只母亲的手，把沿途欠发达的城市一一拉上时代的快车。不久的将来，中国发展最快的地区将是京九经济增长带。

历史在选择聊城，京九铁路在召唤聊城，聊城由一个不通火车的偏隅之地一举成为京九线上的重要枢纽。从此以后，聊城的东方有一条青龙，那是京杭运河北上；聊城的西方有一只白虎，那是京九南下的快车。这是一阴一阳两条生命线，极化了聊城的人，聊城的地，聊城的天空；极化了以聊城为中心的太极运动。

聊城默默无闻的时代过去了！

抓住机遇，抢占制高点，比速度，比发展，已是聊城人的共识，更是聊城人夜以继日为之奋斗的心愿。

历史在选择聊城，天下再也不敢小聊城；但有一句话反问的好，那就是：聊城何以对天下？

聊城人的回答是：要发展，要高速度地发展，要高速度持续性地发展。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聊城人首先要研究的课题，那就是：聊城目前向前发展的基础是什么？

在农业方面：

聊城地处黄河中下游冲击平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现

有耕地 126 万亩，自然条件优越，农业资源丰富，有较大发展潜力。

粮食是本市的主要农作物，但经济作物仍然是棉花，聊城市是全国植棉百强县市和全国优质棉生产基地。

蔬菜、瓜果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特别是近几年来，冬暖式塑料大棚发展很快，“鲁西大菜园”的整体框架开始形成。此项举措不仅使本市的市民一年四季都能吃上质优价廉的新鲜蔬菜，而且源源不断地运往京津、宁沪等大城市。

在畜牧业方面，鲁西黄牛是传统的优良品种，肉食鸡和淡水鱼的产量也大大增加。

工业方面，是聊城经济的薄弱环节，主要是没有形成支柱产业和名牌产品，设备陈旧，效益一般。地下能源的发现与利用也处于一般水平，不是聊城的优势。

交通方面，是聊城近几年发展最快的方面。山东的路好在全国是很有名的，但几年前的聊城，既无铁路又无高速公路，交通属于落后地区。

但近年来，京九铁路，济邯铁路，济聊馆高等级公路在聊城同时开工建设，使聊城的交通一跃而成为一大优势。京九铁路从聊城西郊穿过，在聊城境内共设大、小四站，其中聊城站是衡（水）商（丘）段最大的客货两用站，也是京九线十大火车站之一。聊城北站，是衡商段最大的区段编组站和机车维修、调度中心。京九铁路的建设，大大改变了聊城在全国交通网络中的地位，这对于聊城经济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南北有京九，东西有济邯，这是其它城市所无法比拟的。济邯铁路，东起晏城，中经聊城，西至邯郸，全线长 233.16

公里，为一级线路并予留复线。济邯铁路东接胶济线，西连邯长线，成为继陇海铁路之后第二条横贯东西的经济大动脉，这对于晋煤东运和加强聊城与东部沿海地区及西部内陆省份的联系，有重要的意义。

京九铁路与济邯铁路在聊城交汇，形成一个大黄金十字架。

济聊馆一级汽车专用路，东起济南，西止河北省馆陶，全长 147.4 公里。估算总投资 12.0061 亿元。该路设计宽度为 24.5 米，行车道 2×7.5 米，紧急停车带为 2×2.5 米，中央分割带为 2 米，全封闭，全立交，设计时速为 100 公里，1996 年通车到聊城，1997 年全线贯通。该路在聊城市区将设两座大型互通立交桥，两座大型公铁立交桥。届时，一个小时即可从聊城到达济南，4 个多小时到达青岛，将三者之间的行车时间缩短了一半。

旅游资源方面：

聊城风景秀丽，景色宜人，名胜古迹灿若繁星，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交织如画，旅游资源极为丰富。

聊城在运河兴盛时代就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过了济宁，便是东昌”的美誉。

座落在古城中心的光岳楼，“巍然起于城廓闾阎寰之中”，冲汉凌霄，气势恢宏，乃聊城一大奇观，素有“虽黄鹤、岳阳亦当望拜”之誉。

光岳楼为四重檐歇山十字脊过街式楼阁，通高 33 米，楼基为砖石砌成的正四棱台，高 9 米，占地 1236 平方米。台体四面各辟半圆拱门，券至台中心形成十字交叉拱。四层主楼筑于高台之上，方形外加围廓，抬梁式木构架。一楼面阔进

深皆 7 间，设四门八窗，32 根内外槽金柱直达三层。二楼面阔进深亦 7 间，柱列分步与一楼相同，童柱置于一楼挑尖梁上，楼面设平座回廊。三楼系暗层，面阔进深皆 5 间，属楼之结构层。四楼形体骤然缩小，面阔进深皆 3 间，中置空井，四面开冰纹圆窗和四开扇大窗，十字梁下装饰莲花、莲果等吉祥之物。结顶为歇山十字脊，脊顶装一高 3 米、直径 1.5 米的透花铁葫芦。主楼东侧梯口上筑一敞轩，轻巧明快，与主楼浑然一体。

光岳楼高大雄伟、巍峨壮观，是聊城文明古老的象征。古人曾赞美它：“台高数仞，楼高数寻，冲汉凌霄，连云梯月，巍巍然，峨峨然，如翠如翼，昔人所谓‘手可摘星辰’不为过也。”

光岳楼是明初的重要遗物，许多地方又保留了宋元风格，是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由宋元向明清过渡的代表作，有很高的科学价值，1988 年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聊城的另一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即是前文提到的



古运河畔关帝庙——山陕会馆，如今已开辟为聊城地区博物馆，每天接待四方来客。

在聊城流传着一首家喻户晓的民谣：“东昌府，有三宝，铁塔，古楼，玉皇皋”。被人誉为三宝之一的铁塔，位于聊城东关运河西岸，原护国隆兴寺东南角，始建于北宋时期，是本市现存最古老的建筑。

铁塔为八角形楼阁式佛塔，现为12层，通高15.8米，由塔身、塔座两部分组成。

塔座为石砌正方形上下叠涩不对称式须弥座，高2.90米，底边长3.17米，占地10.50平方米。塔座牙脚四角成卷云状。束腰四面均有伎乐人物浮雕。南面中间有二龙，作上下翻滚状，左右各立一伎乐人；北面中间有二凤，雌雄追逐，作顾盼相成之状，左右各立一伎乐人；东西有两个伎乐人，身穿长衣，手持飘带，翩翩起舞，西面也是两个伎乐人，左者前挎腰鼓，双手作敲击姿势，右者曲臂作站立状。束脚东南、西南两角，各有一金刚力士，怒目凸腹，手按双膝下蹲，作顶托状。



塔身用生铁仿木构分层铸造，逐层迭装而成。铁壳中空，厚6—10厘米不等。第一层塔身直径1.53米，底部一周宝装

覆莲，塔身八面设置成四个假门与四个假窗。门额上有门簪四枚。簪面成削角方形。假门上均有铺首和门钉，东西两方做成半掩门式。假窗为破子棂窗。二至七层塔身无门窗雕饰，8—10层仅雕饰格窗。各层倚柱，斗拱与一层相同，每层塔身都有腰檐平座，平座均为四铺作单抄计心造，周绕栏杆。腰檐仿木铸造，有檩枋、檐椽、飞椽、瓦垄及斜脊等。塔身逐层收分，塔顶置仰莲葫芦瓶式宝刹。

环城湖是聊城最有开发潜力的旅游资源。

环城湖由原护城河拓展而成，宋熙宁三年（1070年），博州（即聊城）始筑了土城，开挖城池（即护城河），明清两代历有加宽修缮，清雍正五年，重修护城河外的护城堤时，河面又有加宽，近代，则形成环城的湖泊。解放后，古城墙内外堤已改建为环城路，湖岸用石块垒砌加固，栽种了四季常绿的花草树木，真可谓：

四面荷花八面柳，
一城秋色四城湖。



环城湖共有八个大湖区，分二十块水面，面积达4.2平方公里，略小于杭州西湖，比“四面荷花三面柳”的济南大明湖大五倍。

环城湖不仅景色迷人，而且资源丰富，宽阔的水面，平坦的湖底，适于各种鱼类和水生植物生长。目前，湖内养有鲤鱼、草鱼、鲫鱼、甲鱼、罗非鱼、武昌鱼、大虾等30多个品种，还养殖莲藕菱角，芦苇和蒲草数千亩，富饶的环城湖为聊城人民提供了丰富的水产品，同时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水禽来此繁衍栖息。湖中水鸟成群，翠鸟云集，远道而来的海鸥和白天鹅更为环城湖增添了勃勃生机。

水产丰富的环城湖还是钓鱼爱好者的福地，因而被中国钓鱼协会看中，将其列为全国钓鱼基地。湖边建设有钓鱼台及宾馆，每年都要在这里举行全国性钓鱼比赛。

除此之外，聊城市还保留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权寺遗址”和“堂邑文庙”、“范筑先纪念馆”等二十八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仅城市规划区之内就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十六处之多，文物十分集中，旅游资源十分便于利用。

另外，以聊城为中心，全面考虑整个聊城地区的旅游业，也是大有前途的。距聊城30公里的东阿有建安奇才曹植之墓，西南45公里则有阳谷景阳岗、狮子楼，是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中最脍炙人口的故事发生地。临清位于聊城西北50公里，是另一部古典文学名著《金瓶梅》的故事发生地，现仍留有不少与之有关的文化遗迹。聊城作为东昌府，与《水浒》《金瓶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还是《聊斋》中“胭脂”故事的发生地。完全可以设想，以聊城为中心，开发古典名著旅游线，那也将是十分吸引人的。

综上所述，聊城目前发展的优势在交通方面和旅游资源方面。

而旅游资源且大部分是运河的产物，京杭运河还给我们留下了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1994年元月，国务院（国发3号文）公布了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聊城市榜上有名。加之国家公布的第一、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共有九十九座城市被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聊城能位列百座名城之内，实为聊城人民的莫大荣耀，也实为聊城发展的优势之所在。

如果你乘上飞机从空中俯看聊城，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风貌一目了然。



当飞机飞行在单调在鲁西平原的黄土地上，蓦然，一片绿洲，一座水城呈现在你的眼前，紧紧地吸引住你，这就是聊城。整个城市之中有一片环形的湖面，而湖的中心，就是那座面积为一平方公里的东昌古城，恰如一副方方正正的围

棋盘飘浮在千顷碧波之上。天元之位，光岳楼巍然耸立，四个星位各有一片明镜似的子湖，那原本是古城内排水系统的四个汇水点。古老的大运河，宛如一条玉带在东城区蜿蜒而过，文物古迹闪烁其间。环城湖之外，是新城区，宽阔的公路四通八达，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城中有湖，湖中有城，城湖交织如画，完整地保留了古城格局，这正是历史文化名城的精华所在。

来聊考察的园林、规划专家，把聊城誉为“中国的威尼斯”，“东方的诺亚方舟，”足以可见名城价值。

至此，可以肯定地说，聊城的工业、农业、科技都没有很大的优势，充分利用聊城飞速发展的交通优势，发挥历史文化名城优势，优先发展文化旅游事业，是聊城最明智的选择。旅游事业有“无烟工业”之美誉，投资少、见效快、无污染，以此带动商贸业、第三产业的全面发展，最终将带动聊城的整体飞跃。

聊城的领导者对此早有清醒的认识，在过去的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工作中，成效显著，功不可没。

古城的保护和新城的建设开发是一个极不易解决的问题，中国许多著名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都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例如北京不但在五十年代拆除了城墙，而且还拆旧城建设新城，新城和古城分不开。

城市建设搞中心开花是中国城市建设的通病。

古都西安也没解决好这一问题。西安钟楼本来是城市的中心，又是城市的制高点，但是在钟楼四周却建了好几栋在高度和体量上都大大超过钟楼的建筑，使原本十分雄伟的钟楼显得十分矮小，象个小弟弟一样，这样的城市风貌与我们

所希望的古城风貌格格不入。

成都为了修“万岁展览馆”，竟然将皇城拆除，金水河、御河填平，令人痛心疾首。而聊城在这方面比其它城市都做的好一些。

早在1958年，聊城在制定第一个城市规划时，就做出了离开一平方公里的东昌古城区和东关运河区，而在原北部的空旷地带放开手脚发展新城的英明决策，这一决策荫泽数代，也正是聊城能保留有古城格局而被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原因。当时还规定：一平方公里的古城区内改造的新建筑，不能高于光岳楼墩台，也就是不能建设二层以上的楼房。在此后的这些年代里，聊城市政府还多次下文件，三令五申，不准任何人以任何名义填堑护城河（即环城湖），使古城风貌和古城格局得到较好的保护。

而且，近几年来聊城政府在建设、保护文物景点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的投入。

古建筑维修方面：

1984年5月——1985年12月对光岳楼四层主楼进行了全面维修，这次维修遵循了“保持现状、恢复原状”的原则，修缮了四层外檐和顶部，更换了部分檐柱，加固了部分金柱。1992年3月——1993年10月对光岳楼墩台进行了复原加固工程，拆除了“文革”时期在墩台外面抹上的一层水泥皮，重砌了大墙，平台、过街通道也进行了铺漫，更换了通道四门。这个阶段的维修共花费了十年的功夫，投资135万元，恢复了光岳楼古朴雄伟的英姿。

与此同时，为了保护光岳楼的环境，市政府实施了光岳楼广场开发工程。1991年12月开工建设，1992年5月底竣

工，总投资 1200 万元，拆迁面积 15333 平方米，开发总面积 223000 平方米，建成总面积 12000 平方米。建筑造型别致，楼群襟连，飞檐交错，结构精巧，是一处典雅秀美的仿古建筑群，又是一处集文化、娱乐、饮食、商贸、旅游为一体的新型建筑群。

如今的光岳楼雄居古城中心，是聊城的象征、心脏和灵魂；位于天元、皇极、又是城市阴阳之平衡点，极阴极阳之精华点。就建筑本身而言，它的高度和宽度都是九丈九尺，是极阳之数，它是一切都法于阴阳，寓于玄机，集城市精华于皇极，又控制整个城市于指下，光岳楼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聊城的象征。

山陕会馆的全面维修始于 1995 年，此次维修对山门、戏楼、献殿进行了揭瓦修缮，重饰彩绘，恢复了献殿与正殿之间的空间布置，目前工程还在继续进行。

聊城铁塔 1949 年以后，也进行了两次较大的维修。第一次是 1973 年 3 月，维修前只残存五层塔身，此次修缮将塔基向西北高地迁移了六米，清理了地宫，出土了大量佛教文物和辟支佛舍利，重装了七层坠落的塔身并重铸塔刹。第二次是 1989 年 5 月，主要是对塔身的残缺部分进行了修补。经过修缮的铁塔造型更加完美，层次更加分明，峭然耸立于古运河畔。

海源阁的重建是发展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大举措。著名藏书楼海源阁的出现是东昌府文化发达的典型代表，近代毁于战乱，文革前被彻底拆除。1992 年 10 月，聊城市政府博采众议，筹集巨资将海源阁重新修复。重修之楼，坐其原址，因其旧制，单檐歇山，上下两层，并设左右配房。落成之际，海

内外名流纷纷题字作画致贺。现馆内藏有李苦禅、臧克家、启功、沈鹏、刘炳森、王学仲等名家字画数百幅和大批图书文物。胡乔木同志题写的“一人致力万人受惠，四代藏书百代流芳”楹联，醒目地悬挂在海源阁大门两侧。今日，海源阁以其独有的魅力吸引着无数游人，前来学习、参观者络绎不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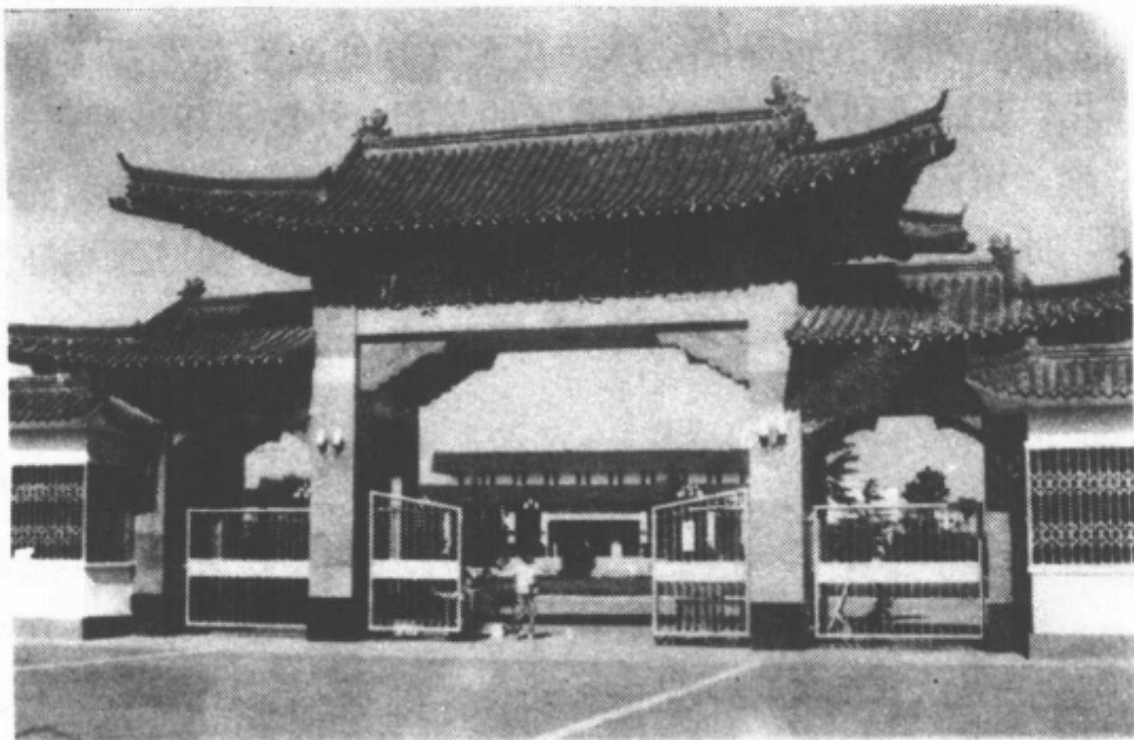
傅斯年陈列馆的开发建设。傅斯年是近代著名的学者，五四运动的闯将。傅家也是聊城“任、邓、朱、傅、耿”五大家族之一，傅斯年的七世祖傅以渐是清代的开国状元。“傅氏祠堂”原位于东关街路北，存有正堂五间，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聊城市政府决定依托“傅氏祠堂”建设傅斯年陈列馆，目前已投资80万元，拆迁征用土地近千平方米，将其扩建成傅斯年陈列馆。为了加强对傅斯年的研究，扩大聊城知名度，加强与台湾的文化交流，1996年聊城市人民政府在聊城主办了“海峡两岸傅斯年学术讨论会”。

1988年，为纪念抗日民族将领范筑先，市政府在光岳楼北侧，也就是他殉国的地方，建设了范筑先纪念馆，纪念馆占地2040平方米。纪念大厅为仿古式木构建筑，单檐歇山，筒瓦覆顶，转角带廊，挑角飞檐。馆内有邓小平亲笔题写的“范筑先将军殉国处”碑石。

孔繁森是新时期共产党领导干部的楷模，他出生于聊城市堂邑镇五里墩，长期在聊城学习工作。1988年8月，孔繁森同志克服种种困难，再次进藏工作。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在去新疆塔城考察边贸途中，因车祸殉职，年仅50岁。1995年7月4日，中宣部正式批准建立“孔繁森纪念馆”。

孔繁森同志纪念馆坐落于碧波荡漾的环城湖畔，占地面

积 10350 平方米，纪念馆建筑面积 1400 平方米，主厅 15 米，外形为双重檐，四周环廊式结构。大门上镶嵌着江泽民总书记于 1995 年 7 月 28 日亲笔题写的“孔繁森同志纪念馆”八个鎏金大字。



孔繁森同志纪念馆建成后，前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成为全国进行革命理想和革命人生观教育的重要场所和永久性基地，对聊城的发展有巨大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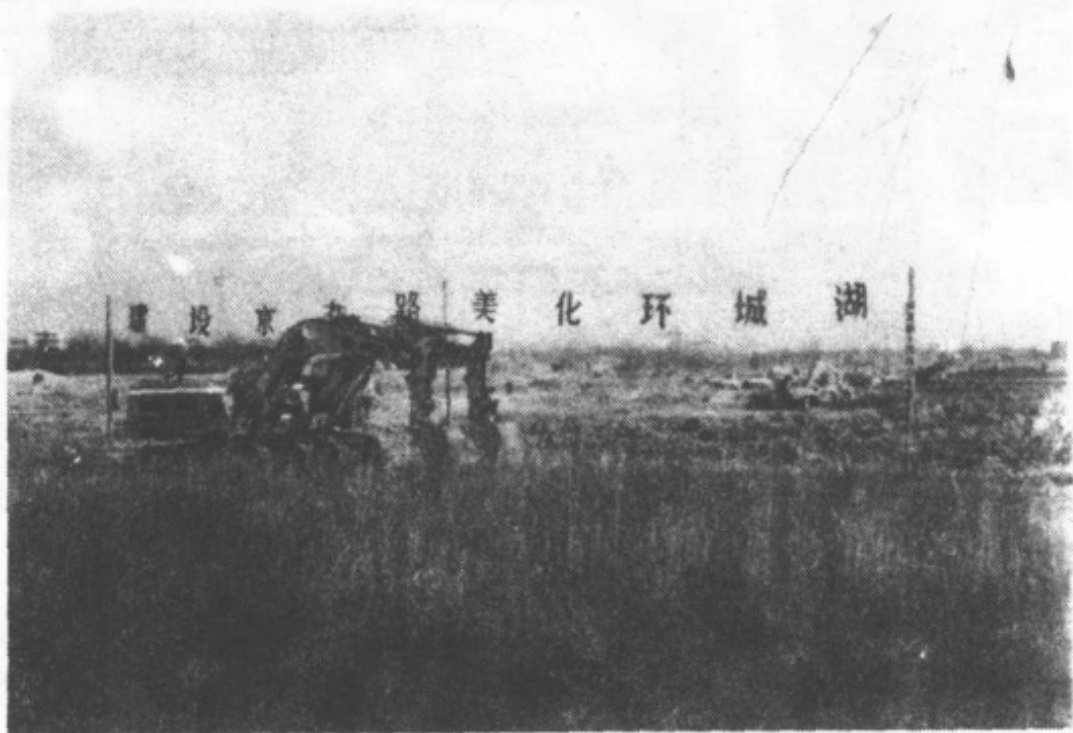
环城湖是我国北方城市中罕见的人工湖泊。她物产丰富，景色秀丽，是得天独厚的风景旅游区，被人们称为鲁西平原上的一颗明珠。

近几年来，聊城当地政府抓住各种机遇对环城湖风景区进行了成功的开发建设。

1984 年，在环城湖西北区中心筑造了湖心岛，在岛上建造了望岳亭、溢香斋、翠园、垂花门、沁园、观景台、金鱼馆、垂钓台、登岛码头等设施，建成后的湖心岛如同环城湖

中的海市蜃楼一样，对美化环城湖作用很大，从而吸引了大量的游客。

八十年代以来，环城湖以向发电厂供水的方式，吸收了大量资金，建造了环城湖护坡。又经陆续投资，建成了环城湖公园，对城市的绿化、风景甚至气候的改变都发挥了良好作用。之后又利用兴修京九铁路的契机，开挖了环城湖淤泥。清湖、筑路基、节约良田、争得资金一举四得。据勘舆先生讲，此为土生金，金生水的生旺之象，预兆着聊城的兴旺发达。



1996年之后，环城湖的开发又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淡水浴场，快艇基地，水上竹寨，钓鱼台宾馆，好戏连台。

1997年是国际旅游年，聊城还要下大气力开发旅游景点，聊城人民是忘不了大运河的，今后的开发重点是运河旅游线。

这条旅游线的景点有龙湾、山陕会馆、天主教堂、运河

大、小码头、闸口、傅斯年陈列馆、护国隆兴寺铁塔、运河古槐等文化遗址。

开挖、清理、疏通此段运河，使之与环城湖水系相沟通，开辟水上旅游线，是运河旅游线的总体规划。

运河旅游景点开发的重头戏是建设“运河文化博物馆”。

此馆拟定设在山陕会馆东南部，东至运河，西至环城湖，北到一中小桥向西小路，南到环城湖与运河相衔接外水闸。这是一块介于运河、环城湖、山陕会馆之间的金三角地带，馆址总面积应在 85 亩左右。运河文化博物馆建筑面积 5000 平方米，其它馆外附属设施，包括环湖游廊、停车场、绿地小区、小桥流水等，总面积约 60 亩。建设内容包括：陈列厅；南北附厅；博物馆附属建筑包括宣教、电教、图书资料室、文物库房、会议室、办公室等，建筑面积需在 1200 平方米左右。

另外，傅斯年陈列馆的继续开发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傅斯年陈列馆位于聊城东关街路北，东 0.5 公里有京杭大运河，其南一公里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陕会馆，西一公里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光岳楼，北 0.5 公里有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铁塔，所处位置特别显耀，是交通和浏览的必经之地，开馆后已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目前陈列馆已完成了第一期建设工程，展室面积过于狭小，院落环境也只实施了一半，所以尚不能形成一个富有吸引力的文化旅游景点。为此，聊城已决定 1997 年继续拆迁，扩大建设。建成后的陈列馆将是全国傅斯年研究的中心，成为一处有极大吸引力的文化名人旅游景点。

近几年来，聊城还提出了恢复隆兴寺，即铁塔寺的构想。

隆兴寺俗称铁塔寺，原位于聊城市东关街北侧古运河畔。隆兴寺始建于唐代，宋明时期极为兴盛，是聊城市著名的寺院，也是鲁西的佛教中心。清末隆兴寺开始衰败，文革时期更遭毁坏，现仅存观音阁遗址和宋代铁塔一座。铁塔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我国为数极少的铁铸佛塔，为东昌三宝之一，在聊城人心目中享有盛誉。很多年来，聊城人民就有恢复隆兴寺的愿望，特别是 1994 年，聊城被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后，恢复隆兴寺的呼声更为强烈，恢复隆兴寺的构想也日臻成熟。

首先，规划部门在制定历史文化名城规划时就已经将恢复隆兴寺景点作为名城保护的一项重要内容。文物部门更是多次提出，为保护好、管理好、利用好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铁塔，应尽快恢复隆兴寺。隆兴寺位于新旧城交界处，原址占地约 50 亩，目前由一座即将淘汰的运动场占据，大部空闲，不需过多的拆迁，且此处西北南三面临环城湖，东靠古

运河和铁塔商场，很适宜建设文化旅游景点，因此恢复隆兴寺对于美化环境，改善城市风貌，搞好城市建设，发展历史文化名城都是极其有利的。

其次，恢复隆兴寺可以更好地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极左路线受到批判和纠正，我国的宗教政策逐步得到落实。江总书记就曾于1993年11月7日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说过：“利用宗教的教义教规和宗教道德中的某些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

如今鲁西、豫北、冀东有不少人皈依佛门，但苦于没有活动场所，难以正常活动。所以恢复隆兴寺对信徒们进行正确的引导，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和宗教的良性发展，从而带来较好的社会效益。

第三，恢复隆兴寺可以改善投资环境，加快对外开放。港台、东南亚、日美各国的华侨大多是信佛的，聊城恢复隆兴寺这样一座辉煌壮丽的寺院，有助于改善聊城的投资环境，有利于吸引外资外商，便于引客，也便于留客。另外，恢复隆兴寺还将使聊城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从而促进聊城的对外文化交流，提高聊城的知名度，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

第四，恢复隆兴寺可以为聊城增加旅游景点，改变铁塔孤单不成景点的现状，并可以每年定期举办庙会，大量吸引国内外的游客和香客，增加旅游收入，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所以，恢复隆兴寺对于适应聊城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发展旅游事业，加快对外开放，促进聊城文化经济的全面腾飞都是极其有利的。

聊城在进步，聊城在发展，聊城要再现辉煌，聊城要超越昔日的辉煌。

(林虎 摄)



聊城前进之势不可阻挡，就象谁也不能阻挡中国的富强一样。

科技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的脑子也要变。同样聊城人也要在观念上有很大的改变。

聊城要象借运河兴盛而兴盛一样，牢牢地抓住京九快车的机遇，但是坚持长久的、持续性的高速发展却是一个新课题，一个运河文化没有解决的问题。

交通条件毕竟只是一个外部条件，难道外部条件变化了，不如以前有优势了，聊城也就要再次衰败吗？所以，苦练内功，不断地为聊城的前进注入新的活力，才有长久的生命力。一个城市也象一个人一样，人进步需要提高素质，城市的兴盛应是一个整体的概念，这就是一个大文化的概念，只有高精尖的科学技术进步与高层次的文化协调发展，合二为一，才能真正提高一个城市的素质。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早就有英明决断，那就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物质文明是有形

的，为阳，精神文明是无形的，为阴，两手都要抓，实际上也是一个阴阳平衡的问题，这是辩证法，是东方文化的思维方式。

当今历史的潮流是西方文化占统治地位，这种文化是建立在分析型的思维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科学、现代技术，我们要引进，要学习，但是科技进步，财富膨胀的同时，环境问题，能源问题也告诫人们，这条路并非可以一直走到天亮。

北大著名教授季羨林（聊城地区临清人）先生一语惊人，他认为21世纪是西方文化让位于东方文化的过渡期。那是因为建立在分析型思维方式的科学技术已经发现，宇宙中有很多东西已经不能继续分析下去了。而东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是综合性的，也就是整体的普遍联系的思维方式，这样的思维方式也许更能接近事物本质。

21世纪是东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世纪。在人类发展进程中，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也是符合太极阴阳互补规律的。

在“五四”时期，有识之士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而当今社会，“科学”与“文化”将是引导人类进步的新的两面大旗。明确地讲，就是西方的科技加东方的文化，中西合璧，共建大同世界。

——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然之路。

现在再回头看看聊城，有些问题就比较清楚了。

聊城为何未能在运河衰败之后保持已往繁荣？其一是物质生产方面，没能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产业，其二在精神建设

方面，没能发展自己的文明水准，与之相反，却有社会道德颓废之嫌（见前文博平县志载），这在属于运河文化范畴的古典名著《金瓶梅》中更有深刻揭露。所以聊城的繁盛仅仅保持了四百年。

这才是大运河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今日的聊城，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可以借大京九带来的机遇，高速度地发展高科技产业，而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聊城也有个大机遇，那就是聊城出了个孔繁森，他是新时期共产党员的楷模，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孔繁森精神的精华是他的处世观“做一个人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这种处世观既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又是符合东方文化的。东方文化不是泛泛而谈，一个重要的基点是做人的问题；在外延上，东方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佛道儒而已，特别是儒教一直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孔子对于做人也早有高论，简单明了，“仁者爱人”。

繁森深知，爱是人的生命的最基本的意义；圣人早明，爱是人的生命的最终本质。

聊城作为齐鲁礼仪之邦，传统文化渊源深厚，象孔繁森那样有仁德而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工作的大有人在。这些普通的聊城人是推动聊城发展的基础，光辉灿烂的聊城文化需要他们创造。

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人的因素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因此，展望 21 世纪的聊城，我们信心满怀。

任重而道远兮，前程似锦。

1997. 3. 30 天香斋

后 记

本书为迎接1997年5月在聊城召开的“运河文化研讨会”而作。又有将其写成电视系列片解说词的想法。97年3月18日方才动笔，4月底即成书发行，仓促之情，可想而知，谬误之处必定难免，抛砖引玉，蒙羞难及。此书参考了大量有关运河及聊城的资料书籍，参考书目列于后。在此，本人对参考书作者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并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参考书目：

《京杭运河》沈大兴著

《东昌古今备览》刘保柱编著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聊城》郝保奎等编著

《运河名城临清》高志超等编著